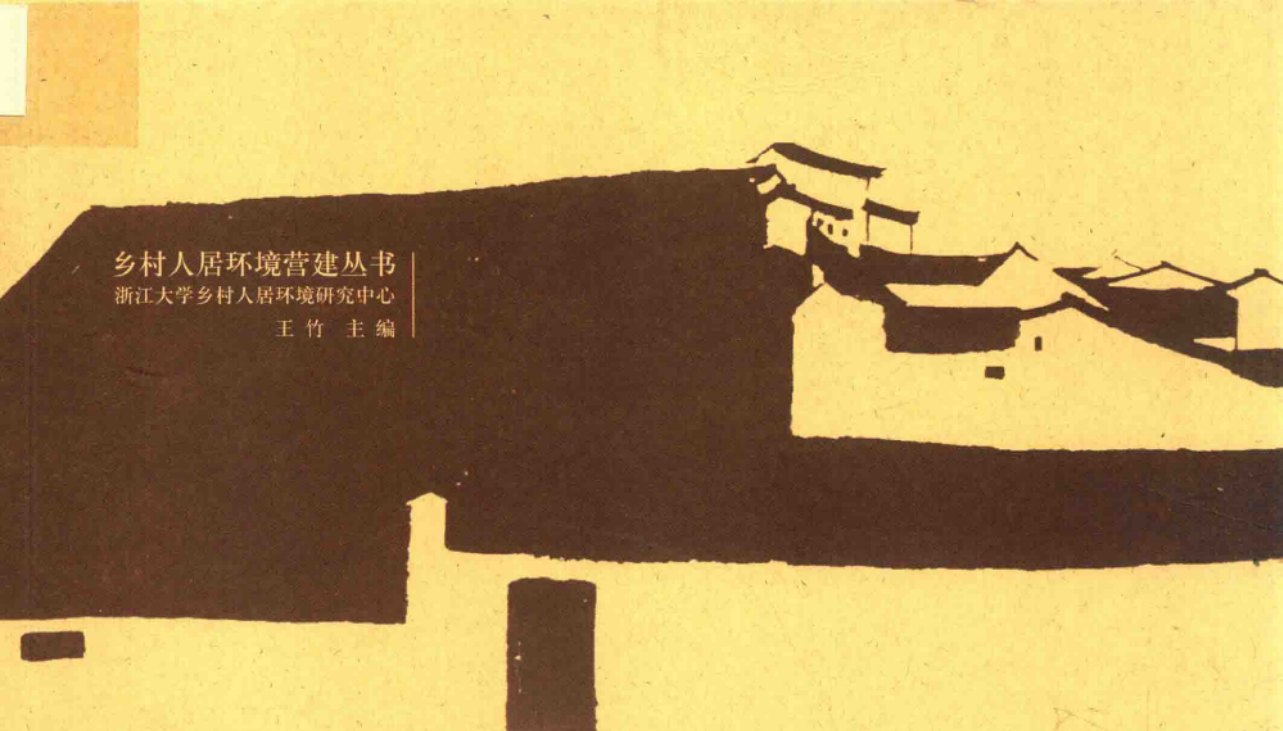




乡村人居环境营建丛书

浙江大学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王竹 主编



主体认知视角下 乡村聚落营建的策略和方法

王 韬 ■ 著

Zhuti Renzhi Shijiaoxia

Xiangcun Juluo Yingjian De Celue He Fangfa

乡村

东南大学出版社

乡村人居环境营建丛书

浙江大学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王 竹 主编

主体认知视角下乡村聚落营建的策略与方法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Rural Settlements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e Cognition

王 韬 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北京地区乡村聚落有机更新的机制与方法研究”(5160802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长江三角洲地区低碳乡村人居环境营建体系研究”(51238011)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 南京 •

内 容 提 要

乡村人居环境一直是社会与学界的重要关注点,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营建”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其价值意义愈发凸显。乡村聚落的营建不仅在于物质环境的更新迭代,非物质要素同样不可忽视,特别是融入其中的行为主体,他们直接影响着营建的开展与实施,重要性不言而喻。本书通过多维视角对主体认知的作用机制进行综合考量,将人本关怀提升至研究的重要层面,试图以一种包容的方式凝练其中的普遍意义、特征与规律。同时,以此为基础展开有关主体与客体、认知与存在、真实与想象的相关探讨,在中观与微观层面“以小见大”地构建乡村聚落的营建策略与方法,为从事乡村聚落研究的相关学者、投身乡村建设实践的相关从业者以及广大关注乡村人居环境的有识之士提供有益参考,以期对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品质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体认知视角下乡村聚落营建的策略与方法/王韬

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9. 7

(乡村人居环境营建丛书/王竹主编)

ISBN 978-7-5641-8485-8

I. ①主… II. ①王… III. ①农业建筑—建筑设计

IV. ①TU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42342 号

主体认知视角下乡村聚落营建的策略与方法

作 者:王 韬

责任编辑:宋华莉

编辑邮箱:52145104@qq.com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江建中

社 址:南京市四牌楼 2 号(210096)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印 刷: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787 mm×1 092 mm 1/16 印张:11.75 字数:272千字

版 次: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8485-8

定 价:48.00 元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发行热线:025-83790519 83791830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传真):025-83791830

序

本书源自王韬 2014 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村民主体认知视角下乡村聚落营建的策略与方法研究》。2009 年,王韬作为我的博士研究生进入浙江大学继续学习,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了关于浙北与湖南韶山等多地的乡村聚落相关研究和实践活动,对乡村聚落的营建策略与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与研究。时逢我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长江三角洲地区低碳乡村人居环境营建体系研究”正在进行,于是王韬便自然地参与到相关内容的研究之中。

乡建已成为当下的热门话题之一,但要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过程不仅复杂,而且艰难。这个艰难不仅是经济与技术的因素造成的,也是认知上的混乱与理解上的误区所导致的。对于乡村聚落的营建而言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特别是在混沌状态当中,需要建立清晰的思考方式。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涉及地理区位、自然生态、经济生产、社会生活、时间阶段、类型差异等方面。乡建不仅仅是空间形态与建筑风貌那些事儿,应认清村民作为乡村主体的地位,规划师、建筑师在进行规划设计时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乡建应该是分类型、分层次的,有些是小众化的需求,有些则是整体系统的普适性需求。乡建的途径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化的,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参与到乡建中都应该受到鼓励,乡村聚落营建的策略和方法也必然从一个多元化的角度展开。

目前,乡建正逐渐演变为完成任务与消费需求,在各种乡建名义下,大小资本、各路精英、建筑师们纷沓而至。一些传统形态的恢复、地方风貌的打造、乡土民俗的再现、传统技艺的延续等,尽管都在客观上表达了乡建的良好愿望,但是这些看似“接地气”的表达方式却演变成了一种宏大的运动或个人情怀的自我表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对“乡建真实”的关注。因此,面对诸如以上背景和问题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乡村聚落营建策略与方法成为本书的关注点。

本书的研究内容针对目前我国乡村发生的一些负面变化所导致的在地域文化、生态环境以及乡村风貌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主体认知视角的研究思路,将主体与客体、认知与存在、真实与想象纳入系统的范畴进行综合考量,提出了从强势作为到谦卑无为、从他者想象到身份认同、从乡土自发到文化自觉,从形态重写到场所誊写等面对乡村建设的一系列营建思路,并构建了适合乡村聚落具体的营建体系,这些策略与方法为引导当下乡村聚落的营建向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2019 年 5 月 12 日

于杭州求是村

前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建设已走过了四十余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负面的变化。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延伸,一些曾经质朴的田园风貌正面临着地域文化失语、生态环境退化、空间形态无根等问题的蔓延。对于乡村聚落的营建而言,如何在巩固成果的同时解决当下的问题,从而使乡村风貌得以全面改善和村民生活获得实质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以本人博士论文为基础并结合近些年在乡村人居环境更新领域的相关实践与思考继而成文。文中借鉴了国内外乡村建设的经验并分析了我国乡村发展的现状问题,以建筑、景观、规划学科为基础,以聚落空间营建为主旨内容,通过“乡村解读、理论把握、机制分析、策略提出、实证研究”五个方面形成逐层推进的研究路径。首先,对乡村营建的本质意义、演进特征与营建的参与者进行了解读,明确了乡村聚落始终在自组织与他组织两种方式的共同作用和相互博弈中演进,并且确立了基于村民主体的研究立场。其次,围绕村民主体认知的发展框架、演化动力、交互途径与物化基础四个方面,通过借鉴相关理论的核心概念,建立了主体认知视角下乡村聚落营建的研究框架,完成由问题到方法的转化。随后,通过对乡村聚落营建与村民主体认知关系的梳理,分别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建成环境影响下村民的认知方式和演变特征进行了详尽的解析,进而归纳了乡村聚落的发生机制。在此基础上,针对乡村营建中生态自然、社会人文与聚落空间三个层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营建策略与实施原则,并以浙江长兴塔上村为例加以论证,进一步阐释研究成果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著者

2019年6月

浙江大学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农村人居环境的建设是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程度与水平的重要标志,对其可持续发展适宜性途径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已成为学科的前沿。按照中央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要求,围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农村发展质量和水平的战略任务,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要求,为加强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为给建设乡村人居环境提供技术支持,2011年,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成立了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中心”主任由王竹教授担任,副主任及各专业方向负责人由李王鸣教授、葛坚教授、贺勇教授、毛义华教授等担任。“中心”长期立足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社会、经济与环境现状,整合了相关专业领域的优势创新力量,将自然地理、经济发展与人居系统纳入统一视野。截至目前,“中心”已完成120多个农村调研与规划设计项目;出版专著15部,发表论文200余篇;培养博士30人,硕士160余人;为地方培训3000余人次。

“中心”在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攻关中的合作与沟通,积极促进了多学科的交叉与协作,实现信息和知识共享,从而使每个成员的综合能力和视野得到全面拓展;建立了实用、高效的科技人才培养和科学评价机制,并与国家和地区的重大科研计划、人才培养实现对接,努力造就一批国内外一流水平的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批奋发向上、勇于探索、勤于实践的青年科技英才。建立一支在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理论与方法领域方面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人才队伍,力争在地区乃至全国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中心”按照国家和地方城镇化与村镇建设的战略需求和发展目标,整体部署、统筹规划,重点攻克一批重大关键技术与共性技术,强化村镇建设与城镇化发展科技能力建设,开展重大科技工程和应用示范。

“中心”从6个方向开展系统的研究,通过产学研的互相结合,将最新研究成果运用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实践中。(1)村庄建设规划途径与技术体系研究;(2)乡村社区建设及其保障体系;(3)乡村建筑风貌以及营造技术体系;(4)乡村适宜性绿色建筑技术体系;(5)乡村人居环境健康保障与环境治理;(6)农村特色产业与服务业研究。

“中心”承担有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长江三角洲地区低碳乡村人居环境营建体系研究”“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及其机理研究”;四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长江三角洲绿色住居机理与适宜性模式研究”“基于村民主体视角的乡村建造模式研究”“长江三角洲湿地类型基本人居生态单元适宜性模式及其评价体系研究”“基于绿色基础设施评价的长三角地区中小城市增长边界研究”;四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长三角农村乡土特色保护与传承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浙江省杭嘉湖地区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模式及其风貌特征”“建筑用能系统评价优化与自保温体系研究及示范”“江南民居适宜节能技术集成设计方法及工程示范”“村镇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化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等。

目 录

1 绪论	1
1.1 我国乡村发展背景	1
1.1.1 国内乡村发展状况	1
1.1.2 国外乡村发展的经验启示	2
1.1.3 我国乡村建设现存问题	4
1.2 研究现状	6
1.2.1 客体认知下的乡村聚落客体研究	6
1.2.2 主体认知下的乡村聚落客体研究	9
1.2.3 整体认知下的乡村聚落本体研究	12
1.2.4 乡村聚落研究的不足	13
1.3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	14
1.3.1 研究对象与视角选择	14
1.3.2 相关概念界定	15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16
1.4.1 研究目的	16
1.4.2 研究意义	17
1.5 研究框架	18
1.5.1 研究内容	18
1.5.2 研究技术路线	19
1.5.3 研究创新点	20
1.6 本章小结	20
2 乡村营建的解读与诠释	21
2.1 乡村的基本认识	21
2.1.1 乡村的本意	21
2.1.2 乡村演进的特征	23
2.1.3 乡村营建的参与者	26
2.2 两种作用的方式	28
2.2.1 自组织作用下的乡村聚落	29
2.2.2 他组织作用下的乡村聚落	30
2.2.3 共存的必然性与转化的可能性	30

2.3 两种力量的博弈	32
2.3.1 自发建造与统筹规划的立场差异	32
2.3.2 价值资源享有时权力的不对等	33
2.3.3 时效性与持续性更替作用	34
2.4 村民主体立场的明确	36
2.4.1 关于乡村——是村民生活的家园,而不是政治运动的试验场	36
2.4.2 关于营建——是村民的权益体现,而不是建筑师的自我实现	37
2.4.3 关于村民——是乡村的核心主体,而不是被牺牲的局部	38
2.5 本章小结	39
3 主体认知视角下乡村聚落营建研究的理论基础	40
3.1 认知的发展框架——认知发展理论	40
3.1.1 建构主义与认知发展理论	41
3.1.2 图式、同化与调节	41
3.1.3 认知发展的框架建立	42
3.2 认知的演化动力——协同学	43
3.2.1 自组织理论与协同学	43
3.2.2 竞争、协同、序参量	44
3.2.3 认知演化的动力特性	45
3.3 认知的交互途径——传播学	46
3.3.1 传播学	46
3.3.2 传播要素——传播者、受传者、信息、媒介	46
3.3.3 认知交换的传播机制	47
3.4 认知的物化基础——文化地理学与环境心理学	48
3.4.1 文化地理学与环境心理学阐释	48
3.4.2 认知与环境的关联——地方感、地方认同、地方依恋	48
3.4.3 认知物化的存在方式	50
3.5 本章小结	50
4 乡村聚落营建与村民主体认知图式	52
4.1 生态认知图式与人地关系	53
4.1.1 传统乡村的生态构建观	53
4.1.2 人地关系变迁中的环境态度	55
4.1.3 人、地、居的制衡	56
4.2 社会认知图式与作用要素	57
4.2.1 乡土意识与农耕文化	58

4.2.2 社会变迁中认知的变更动因	61
4.2.3 认知变更下文化的增殖与异化	65
4.3 空间认知图式与聚落形态	68
4.3.1 生态环境制约下的聚落空间	68
4.3.2 社会环境影响下的聚落空间	70
4.3.3 建成环境作用下的空间认知	75
4.4 乡村聚落营建的发生机制	85
4.4.1 混合生长的聚落风貌	85
4.4.2 原型自律的居住形态	87
4.4.3 低技高效的建造方式	95
4.4.4 微观诱发下的宏观涌现	97
4.5 本章小结	99
5 基于村民主体认知的乡村聚落营建策略	100
5.1 乡村聚落的生态自然构建策略	100
5.1.1 “共生”环境观的延续	100
5.1.2 适宜性生态技术的发展	102
5.1.3 生态景观评价的落实	104
5.1.4 观念传播主动性的强化	105
5.2 乡村聚落的社会人文营造策略	106
5.2.1 文化形态的分层应对	107
5.2.2 乡土景观的认知与利用	109
5.2.3 地方产业的交互促进	112
5.2.4 价值取向的包容整合	113
5.3 乡村聚落空间营建策略	115
5.3.1 空间结构的真实性还原——由感知到感悟	115
5.3.2 建筑形态的创造性延续——由摒弃到接纳	119
5.3.3 营建过程的适应性干预——由生成到生长	124
5.3.4 表达方式的乡土性融合	125
5.4 乡村聚落营建的实施原则	129
5.4.1 整体性原则——整体联动、协同并进	129
5.4.2 开放性原则——开放构架、公众参与	129
5.4.3 渐进性原则——模式引导、初步建造	130
5.4.4 主体性原则——面向主体、激励互助	131
5.5 本章小结	131

6 实证研究——浙江长兴塔上乡村聚落营建方法	133
6.1 案例选取与研究视角	133
6.1.1 案例选取的背景	133
6.1.2 营建目标的明确	133
6.1.3 主体认知视角下的营建方法	134
6.2 场所信息的把握与村民主体意愿调查	134
6.2.1 场内影响要素的提取	134
6.2.2 建成环境现状的把握	135
6.2.3 村民主体意愿调查	141
6.3 建立生态、产业与人居共生的聚落格局	144
6.3.1 “山、水、田”生态脉络的延续	144
6.3.2 产业布局及用地功能的调整	145
6.3.3 社区微循环空间网络的建立	147
6.4 乡土建筑的承袭与改良	151
6.4.1 整体形态的统一把控	152
6.4.2 单体构成的局部协调	155
6.4.3 生态适宜性技术的创新融入	164
6.5 本章小结	167
7 结语	168
7.1 总结与提升	168
7.1.1 从强势作为到谦卑无为	168
7.1.2 从他者想象到身份认同	169
7.1.3 从乡土自发到文化自觉	169
7.1.4 从形态重写到场所誊写	170
7.1.5 从建筑创作到社会行动	170
7.2 愿景与展望	171
参考文献	172

1 绪 论

吴良镛先生提出: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人居环境研究以满足“人类聚居”需要为目的^①。对于我国乡村人居环境的营建而言更是如此,面向广大乡村人口探索一套适合乡村特点与村民主体的营建方法是建筑规划学科所面对的重要课题。

1.1 我国乡村发展背景

1.1.1 国内乡村发展状况

我国乡村地区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分布区域广、数量大、人口多、文化底蕴深厚等特征,乡村建设一直是我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 世纪以来,围绕“三农问题”展开的乡村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各阶段都是所处时代的界定式应答。对于目前乡村建设而言,不仅应理性地把握其发展历程,而且也应基于时代背景思考乡村建设的发展方向。

1) 发展历程

我国乡村发展经历了诸多起落,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在中国不少地区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并经过土地改革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建房高潮。乡村建设也在这一背景下稳步发展。尽管在 1956 年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但农业辅助工业、农村辅助城市的二元格局使得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严格的户籍制度加上城乡产品流通的限制,导致三农问题不断凸显,这成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1978 年改革开放开始,从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到之后的小康建设,充分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整体收入也随之提升,农民的精神生活也逐渐丰富。但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升温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2005 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重要的二十字方针,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标志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体现了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乡村风貌营建的有机统一。2017 年对于乡村发展是关键的一年,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新二十字方针,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反映了乡村振兴不仅是产业的振兴,也是生态的振兴、文化的振兴,同时也是农民主体素质的综合提升,相对于之前的二十字方针更关注品质的升级。

2) 时代背景

当前,我国乡村建设正处于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不断延续的大背景之中。

^① 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38.

无论是开放的还是相对封闭的社会系统,这一影响都是普遍的、不可避免的。随之而来的便是乡村地区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及建造技术等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生存环境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市场机制的加强一方面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客观上促进了乡村产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的固有优势,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要素不断地由乡村流向城市。虽然劳动力、土地资源向城市流入的过程客观上促进了城市化,但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仍没有得到改观。乡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生活质量不高、就业率低等都反映出目前城市化缺乏“质”的转变。可见,乡村建设并非单项的城市化过程可以代替,而是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和国家引导强化城乡联系,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资源配置的趋优化。

此外,随传播媒介的不断更新而来的信息爆炸已从城市进而影响到乡村地区,我国乡村社会已由传统的封闭型社会向现代化开放型社会转变,居住者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等方面都不断地受到外界的冲击,直接带来的就是原有生存环境相应变化。多方信息的聚集使居住者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之中,其中既包含了社会主流文化和先进价值理念的引导,也包含了村民在主观情感上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依恋和对固有生产方式的依赖,这便使乡村生活进入一种彷徨期。因此,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分化以及乡村社会内部价值取向的分歧。然而,并非消除这种价值取向的多样性,而是要在认可多样性的基础上加快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1.1.2 国外乡村发展的经验启示

1.1.2.1 欧盟乡村建设

1) 发展阶段

截止到2018年,欧盟有28个成员国,约5亿人口,地域面积438万 km^2 。5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占地域面积90%的农村地区。这与我们具有类似的人均国土面积、文化历程,以及具有内部地区经济差异。欧盟新村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2—1991年):战后重建,以农业结构调整促农村发展。第二阶段(1992—1999年):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向关注农村发展过渡。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农村与农业共同发展。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最有代表性和总结意义的是“2007—2013的农村发展政策”中所指定的四个基本原则:①提高农业和林业的竞争力;②管理土地以保护农村地区的自然环境;③推进农村经济的多样性和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④以“领导+”(LEADER+)的方式自下而上地由地方社会团体联合机构主持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其任务在于组成地方社会团体联合会主持制定他们所在地区的农村发展总体规划,按欧盟政策导向设计农村发展项目,并负责实施和管理发展规划项目^①。

2) 经验启示

首先,政府作为农村建设的启动者。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农村的发展总是落后于城市的发展。政府引导可改变这种发展的不协调。其次,既坚持欧盟原

^① 叶齐茂.欧盟十国乡村社区建设见闻录[J].国外城市规划,2006(4):109-113.

则,又给不同国家和地区留下了选择弹性。在确定了欧盟农村发展政策四个原则后,明确要求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将其转化为本国战略。再次,自下而上由地方社区驱动的规划和项目管理,提倡公众参与,让居民主动地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最后,以基金为支持发展农村项目。

1.1.2.2 日韩乡村建设

日本、韩国在 20 世纪 60—90 年代进行的新村建设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有许多相近之处,并且同为亚洲国家具有相近的文化背景,对两国成功经验的挖掘、归纳与提炼,有助于探讨我国乡村建设的发展之路。

1) 日本发展阶段

日本乡村建设经历了构想、完善以及提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 世纪 50 年代,针对当时日本农民收入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流失严重等问题,提出“新农村”建设构想,并于 1956 年将其纳入国家计划。第二阶段为 20 世纪 60 年代,标志性事件是于 1967 年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提出“把农村建设成为具有魅力的舒畅生活空间”的目标,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第三阶段为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被称为“造村运动”,最具影响力的是“一村一品”运动,其特点是每个村庄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地方特色产品,形成产业基地^①。

2) 韩国发展阶段

韩国新村的建设大致可分为启动阶段、转型阶段以及发展阶段三个时期。启动阶段,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转型阶段,针对前一阶段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发展阶段,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政府仅制定引导性规划、提供支持手段,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②。

3) 经验启示

(1) 准确定位政府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角色。以政治运动方式的农村建设可以缩短农村现代化所需时间,但有强烈阶段性。政府导向的农村建设模式从长远看会产生违背发展规律和农民意愿的结果。

(2) 准确定位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注重启发和唤醒农民的自主精神,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理念,激发其主动性和创造性。

(3) 促使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的共同发展。“造村”运动不仅是物质性的“造物”,更重要的是精神性的“造人”^③。

(4) 制定和完善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法规。

① 王玉莲.日本乡村建设经验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世界农业,2012(6):25.

② 郭静芳.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韩国新村运动的对比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S1):41-42.

③ 颜毓洁,任学文.日本造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现代农业,2013(6):68.

1.1.3 我国乡村建设现存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建设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在此期间不论是产业经济还是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村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实质性改善。然而,伴随着巨大成果取得的同时,也发生着一些负面的变化。

1) 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文化失语

全球化步伐加速,国内一个个新城新区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同时也有一个个曾经特色鲜明的地区渐渐湮没于这种全球化的大潮中。地域性和全球化之间的矛盾逐渐被更多的决策者和建筑师们所关注,并且已展开了一系列有益的实践和探索。作为中国地域文化保留最完好的部分——乡村聚落,也在缓慢地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尤其在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这种影响更为显著。由此也产生了一种现象:越是在落后的地区越能看到曾经的文化脉络,而在经济发达地区这种脉络反而变得模糊或是趋于平庸。这种现象的背后正是全球化与乡土化在新时期乡村建设中权重问题的直接体现,因此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乡土地域文化特色的保护应该合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既不盲从西化又不固守传统,而是将其消化融合成为自身发展的一个影响因素,并且最终形成“乡土建筑现代化,现代建筑地区化^①”的互进趋势,创造性地成为符合本土特征的新地域文化,将这种矛盾转化成一种良性的有序循环。

2) 快速建造下的生态环境退化

乡村聚落空间形态从其形成到完善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聚落形态不断受到自然生态因素的作用,二者通过正负反馈机制的调节相互适应和发展。正是由于演变中渐进的适应才形成了生态景观完整、协调的地方风貌,而非一蹴而就的建设模式。随着城市化的蔓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升级,乡村建设随之加速,建设效率与环境问题愈加凸显。建造技术和材料的革新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依附适应转化为强调征服与改造,而传统和谐共生的生态原则逐渐被破坏。我国山水文化由来已久,很多乡村依山傍水而建,形态与山水相融。但由于城市化的加速、建设用地的紧缺,建造者在利益的驱动下开始填池挖山,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甚至这逐渐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在建设与自然发生冲突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退让而是“消除”。这种“人定胜天”的观念造成了对自然的单向索取,成为一种不可循环再生的发展模式。乡村工业的发展加重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城市的污染治理却使乡村成了转移点,大气、水质、土壤的恶化不仅对人类生存环境产生破坏,更是对生存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3) 生活变更下的土地资源空废

作为乡村生活的基本单元——家庭,其扩充直接带来了住宅数量的增长,但家庭的迁移或更新却没有带来住宅数量的下降。一些家庭新成员的住宅不断向外部扩张的同时,另一些人口则迁入市镇,或长期外出务工加之一些已故老人的原有住宅仍然占据乡村内部中心的位置并逐步被废弃,乡村土地的整体利用呈现出一种松散的格局,即所谓的空心村。这种

^① 吴良镛.乡土建筑的现代化,现代建筑的地区化——在中国新建筑的探索道路上[J].华中建筑,1998(1):1-4.

空置废弃的现象还存在于除住宅外的其他建筑或设施。如乡村原有公共建筑、生产用房,以及传统农业生产需要的大量生产设施及其工具放置点,在新时期都不可避免地被废弃。另外,还有一些未来可能被划入城市发展区域的乡村,村民加建的目的不是使用而是为了在拆除时获得更多的补偿金,这也不同程度地造成了资源和资金的流失。针对类似问题,雷振东提出了“空废化”的概念^①,相对于“空心村”而言,这一概念更加强调现象产生的动态过程,而非某一静止状态。其中不仅包含村民生活方式和观念的转变,而且也包含了传统居住形态对现代价值取向的无力应对。乡村生活的变更、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一方面引起了对建设用地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原有家庭格局的单向发展又使内部各种资源逐渐被废弃,其本质早已脱离自然生态制约的阶段。

4) 观念驱动下的空间形态无根

不同区域的乡村聚落形成了其特有的空间形态和地域特征,居住者基于所处时代、社会 and 价值观的影响自主选址和建造以及改造自身的生活环境,这种历史积淀后所形成的聚落空间蕴含着丰富的地域人文特质和传统根基。然而,当前时代背景下村民与其他建设的参与者在观念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乡村聚落空间的形态结构和地域特征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空间形态的“趋同”与“异化”成为建设的两大误区。“趋同现象”一直是我国乡村现阶段建设的无奈,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乡村聚落风貌特色的缺失。与此相反,还有一些乡村建设为了塑造所谓的特色又陷入另一种误区。大量不加分析的建筑形态被移植,并不同程度地引发了各地乡村不顾实际的攀比。盲目照抄照搬城市建设模式,或简单复制传统的形态,大搞形式主义、形象工程,营造技术普遍粗糙,这已经使乡村远离了清新的乡土气息、旷野的田园风貌,并导致乡村住居形态的衰落及良好社会生活网络的丧失。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相对完整城市规划理论、建设材料、工艺技术等支撑体系无法完全适应乡村建设,导致其整体形态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无序与混乱。

5) 统筹控制下的主体意识缺位

村民作为乡村生活的主体,长久以来一直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乡村聚落系统中,错综复杂的网络在各种要素之间进行着信息的流通与转换,聚落空间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外现,而且也是村民意识的载体。在其发展历程中,村民不断地通过自身的主体意识去感知世界改造环境,这承载着他们对生活需求的理解,体现着居住者固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正是这种具体的主体意识的存在,才使得乡村生活不仅生动而且具有活力。然而,统筹建设下的乡村却逐渐偏离了传统乡村的发展模式,建设者强有力的控制方式使得村民的主体地位呈现出缺失的现象。同时,村民也开始习惯于这种被决策的状态,将自身定位于一种跟随者的角色,导致主体意识的缺位。虽然,宏观的统筹管控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面对某些发展无序的村落必须通过这种方式使其走入正轨。但就乡村持续的发展而言,村民主体意识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主要体现在村民是否成为建设以及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参与者和受益者^②。

^① 雷振东.整合与重构:关中乡村聚落转型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5:14-15.

^② 李新.村民自治中农民主体意识的培养[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1:9-10.

1.2 研究现状

关于乡村方面的研究内容颇多,设计领域极为广泛,截止到2013年10月在中国知网数据平台以“乡村”为主题进行检索共57 681篇期刊论文,其中建筑科学与工程类1 536篇,占总数的2.7%。当检索范围缩小为以“乡村聚落”为主题时,显示570条结果,其中建筑科学与工程类252篇,占总数的44.2%。而将范围进一步缩小为“乡村聚落空间”时,显示148条结果,其中建筑科学与工程类73篇,占总数的49.3%。从中可以看出以“乡村”为主题的研究内容最为繁杂,分布于各个领域,建筑学科的研究仅占其中很小的部分,不具备代表性。而以“乡村聚落”为主题的研究文章中建筑学科所占比例迅速提升,并且在范围之外其他学科的研究也基本是跨建筑学科的。检索具体至以“乡村聚落空间”为主题,虽检索结果文章总数有所减少,但建筑学科所占比例并未显著提升,与之前基本持平。故此推断“乡村聚落”的相关文章能够代表建筑学科在乡村研究方面的大方向。同时,综合以“乡村”为主题的1 536篇建筑学科相关论文,其内容大致涵盖了生态、景观、环境、社区、文化、历史、经济、心理等多方面内容。研究成果呈现出综合化、跨学科的趋势,许多学者也依据学科角度的不同将研究分类。李贺楠^①、朱炜^②总结了不同学科角度下的农村聚落区域分布和形态变迁研究,其包含地理学角度、社会学角度、经济学角度、生态学角度、建筑学角度以及人类聚居学角度;浦欣成^③将研究视角分为建筑学相关学科和其他学科两大类,但也并非局限于本专业而均以跨学科的形式出现。李晓峰^④在其著作《乡土建筑: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中不仅归纳了四类重点的跨学科研究类型,即社会学、人文地理学、传播学和生态学,并且从不同的学科视角给出了针对性的研究方式。综合以上研究不难看出,不同学科的交叉基本围绕着乡村发展的影响要素展开,可将其分为客体要素与主体要素两部分:客体因素包含物质系统(自然环境与建成环境)与非物质系统(社会环境)两类;主体因素包含居住者个体、群体和社区组织等。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乡村聚落的本体(具体如图1-1)。以下据此思路对乡村聚落研究动态进行简要综述。

1.2.1 客体认知下的乡村聚落客体研究

从国内研究现状看,大部分内容集中于乡村聚落客体要素的相关研究,其中主要包含自然因素导向、社会因素导向和综合导向的三个层面。

(1) 自然因素为导向的相关研究主要通过分析生态、地理、气候、水文、资源等自然因素与乡村聚落之间的关联,从而探讨乡村聚落形成、发展、规模、布局的成因,分类并且制定乡村聚落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和营建模式。金其铭在1982年提出农村聚落地理研究的意

① 李贺楠.中国古代农村聚落区域分布与形态变迁规律性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6:8-14.

② 朱炜.基于地理学视角的浙江乡村聚落空间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9:10-16.

③ 浦欣成.传统乡村聚落二维平面整体形态的量化方法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2:20-25.

④ 李晓峰.乡土建筑: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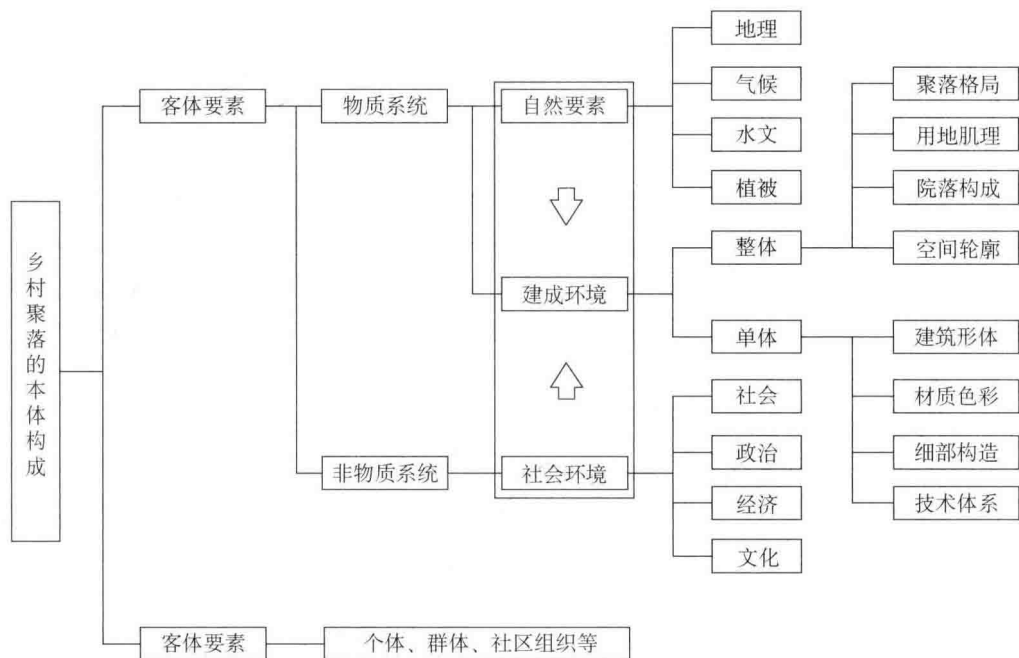


图 1-1 乡村聚落的本体构成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义^①,认为自然环境对聚落的形成布局有重要的影响,并将江苏省村落依据地理要素的影响划分为九类:徐海平原型、淮阴平原型、南部平原型、丘陵岗地型、山区型、湖荡型、沿海垦区型、高沙土地地区型以及圩区型。王建华基于建筑对不利环境应对的思考,从气候的角度分析了江南不同气候区的民居形态和体型变化系数,同时确立了江南地区室外气候与人体中性温度的关系^②。朱炜认为乡村的差异源于地理的差异,其对浙北乡村聚落空间进行了拓扑分析以及居民的满意度调查,并总结了民居对各类环境的应对方式。李建斌认为传统民居中蕴含着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和大量的生态营建经验,根据聚落的选址、空间以及对材料细部的特征剖析,提出了传统民居中“整体”“应变”“适中”等营建思路^③。此类研究虽以自然要素为主导但也都部分地引入了社会要素和主体要素的制约作用,并非完全单项化的思考方式。

(2) 社会因素为导向的相关研究主要以文化、经济、政策、人口等相关问题为切入点,一方面将乡村聚落视为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体探讨其形成的深层机制,另一方面透过社会现象把握社会问题,从而解决现阶段发展壁垒。李建华从文化学的视角分析了西南聚落文化演化过程中的诸多特征,认为土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聚落形态的根茎^④。朱晓青着眼于生产经济和生活居住两大核心环节,解析了产住共同体的动因和范式,并提出了混合增长的

① 金其铭.农村聚落地理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地理学报,1982(3):11-20.

② 王建华.基于气候条件的江南传统民居应变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8:186-188.

③ 李建斌.传统民居生态经验及应用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8:182-184.

④ 李建华.西南聚落形态的文化学诠释[D].重庆:重庆大学,2010:19-20.